

台湾

十大政治要案

叶明 旭晨 卫利 陵春 编著



台湾十大政治要案

叶明 旭晨 编著
卫利 陵春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(京)新登字 10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十大政治要案/叶明主编.-北京: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1994.11

ISBN 7-5035-1059-5

I. 台… II. 叶… III. 政治-案件-台湾 IV. D67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5145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7.375

字数: 165 千字 印数: 1—8000 册

定价: 5.80 元

责任编辑 贾铁燕
封面设计 翟永莲
版式设计 任志珍
责任校对 王洪霞

DH22/11

目 录

- 一 兵败退台 为复职又演闹剧
——弹劾李宗仁 (1)
- 二 披肝沥胆 以致飞蛾扑火
——吴国桢被免事件 (24)
- 三 有染“匪谍” 几次翻案终不成
——孙立人与“台湾兵变” (35)
- 四 抗美反暴 民众怒捣大使馆
——“五·二四”反美事件 (61)
- 五 以卵击石 反对党胎死腹中
——雷震与《自由中国》案 (79)
- 六 全盘西化 狂书生指斥传统
——李敖与《文星》案 (107)
- 七 厝火积薪 选举终成导火线
——中坜事件与党外势力的兴起 (131)

八 水火无情 党外势力受挫折

——《美丽岛》事件…………… (153)

九 黑白勾结 浪打政坛几时休

——江南命案…………… (181)

十 八旬老翁 奔走两岸促统一

——胡秋原被开除党籍…………… (217)



兵 败 退 台

为复职又演闹剧

——弹劾李宗仁

就事情本身而言，李宗仁被弹劾罢免“副总统”，实在不能算做法律事件，整个过程仅为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。但在整个事件中，双方又都以法律为借口，攻伐对方，把政治企图隐蔽于法律形式之下。可以说，法律在此被戏弄了一番。

（一）违命竞选“副总统”

1946年11月15日，国民大会开幕，在大会期间制定了宪法。国民党政府声称要从速召集行宪国大，选举正副总统。

这一次，国民党并未食言，很快就决定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行宪国大，并由此产生正副总统。所谓选举正副总统，实质上只能称选举副总统。因为具有特别权力的总统宝座，早已非蒋介石莫属了。按理说，有职无权的副总统，并不是大热门，但此次却被炒得火热。本来，如果蒋介石从一开始就行使其专制权力，指定人选，当然无人抗命不从。但志得意满的蒋委员长，一时兴起玩了一道公正。他公开声明：“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。”他认为，副总统只是个无事可干

的闲职；再者，无论是谁，不经他本人的提携是不可能当选的。不曾想，此时跳出来一个叫他堵心的李宗仁，给他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烦。

当时，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，职位虽高但无实权。由于李宗仁待人宽厚，没有架子，喜欢接触知识分子，并在处理学生运动中采取和缓的对策，取得很好的效果，一时声誉较高，口碑甚佳，有“民主将军”的美称。这种形象，与蒋介石的独裁专断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
1948年，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，国民党军队处处失利。美国老板对蒋介石大为不满，到中国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调查的魏德迈在访华声明中，严辞指责南京蒋介石政府“麻木不仁”、“贪污无能”，并称“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”。

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答复美国国务院的征询意见时也称：“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，其资望已日趋式微，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。”而李宗仁却被他看好：“李宗仁的资望日高，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，不足置信。”因而，美国政府支持李宗仁的倾向非常强烈，并着手帮助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的角逐。

李宗仁在北平的职位上，此刻正处于进则无路，退则不忍的境地。在两难之际，获得美国人的支援，使他大为振奋，加入副总统的竞选行列。因为无论如何，副总统有着取代总统的可能性。

当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桂系老友、时任“国防部长”的白崇禧、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及黄绍竑等人时，由于他们并不清楚李宗仁竞选的政治背景，认为他成功的希望很小，都劝李宗仁放弃这一意图，另行竞选“监察院院长”。他们的主

要顾虑在于，李宗仁参加竞选必然会遭到蒋介石的反对，从而必然落选。而且，违背蒋介石的意志参加竞选，必然会引起双方的冲突，由此也会将“桂系”卷入漩涡，殃及自身。

他们的担心被证明有一半的道理。蒋介石果然对李宗仁的竞选活动极为不满，并亲自策动了一系列阻止其当选的活动。按照李宗仁本人的说法是，蒋介石之所以要阻止他的当选，主要是蒋对他的“作风开明、颇为全国清议所重”有所顾忌，因为蒋介石所喜欢的只是那些“国人皆曰可杀”之人，以利其操纵。

蒋介石阻止李宗仁竞选的第一步行动是提出所谓“由党提名”的主张，即收回“本党同志可自由参加竞选”的允诺，而要求凡国民党人士如欲参加竞选，应由党内先行提名。此举遭到李宗仁、程潜等人的坚决抵制，从而不了了之。

第二步行动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劝李宗仁放弃竞选，理由是避免由于党内人物竞争而引起国民党的分裂。对此，李宗仁表示不能从命。在《李宗仁回忆录》中，他对这次会面有生动而有趣的描写：

我说：委员长，我以前曾请礼卿（吴忠信）、健生（白崇禧）两兄来向你请示过，你说是自由竞选。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，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，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。

蒋先生说：为什么呢？你说给我听。

我说：正象个唱戏的，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，如今已经粉墨登场，打锣鼓的、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，马上就要开口而唱，台下观众正准备喝采，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尔掉头逃到后台去呢？我在华北、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，何能无故撤销呢？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罢！

蒋先生说：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，你必须放弃。

我沉默片刻说道：委员长，这事很难说！

你一定选不到。蒋先生似乎也动了气。

你看吧！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：我可能选得到。

蒋先生满面不悦，半天未说话。我便解释给他听，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……

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。他听完我这话，满面怒容，一下便站起来走开，口中连说：你一定选不到，一定选不到！

我也跟着站起来，说：委员长，我一定选得到。

无奈之下，蒋介石使出最后的手段，把孙科抬出来与李宗仁竞争。与李宗仁相比，孙科有以下几方面优势：第一，孙科是孙中山之子，孙中山的形象和地位能为其争取很多感情上的选票；第二，孙科是文官，而社会上对于军人参政有很大的反感和逆反；第三，孙科是广东人，能分散李宗仁在两广的选票；第四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蒋介石全力支持他，并调动他的财力、宣传工具、个人影响为孙科所用。

1948年4月23日，“副总统”选举报票开始，初次选举无人获得法定票数。4月24日，投票继续举行，仍未分出结果。但气氛很热烈，各方候选人各显神通，挖墙角、揭丑闻、拉同盟、找关系。盘外招尽使无遗。李宗仁听从黄绍竑为其设计的“以退为进”战术，于次日宣布退出竞选，声称竞选不民主，幕后压力太大。此举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喧哗，其他候选人为剖白自己也纷纷宣布退出竞选。国民大会不得已而宣告休会，延期再选。蒋介石因此陷入尴尬的境地之中，迫不得已只好辗转婉言劝说李宗仁恢复竞选。4月28日，国大恢复投票，仍旧没有人达到法定多数。4月29日，第四轮投

票开始。此时，与李、孙二人同时竞选的程潜、莫德惠、徐傅霖均已先后退出，只留下李宗仁和孙科同台较量。最后，李宗仁以 1438 票对 1295 票击败孙科，当选为副总统。

李宗仁连命竞选副总统成功，使他在对抗蒋介石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分。他能当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：第一，美国人对李宗仁的大力扶持；第二，社会上对蒋介石的统治心怀疑惧，希望有人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；第三，李宗仁本人有一定的社会威望。他指挥的台儿庄战役，使其获得抗战英雄的形象，他和平解决学生运动为其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。又如，他曾就准备竞选事宜函告胡适，胡适对其表示支持，令他大为自得，马上以此见诸报端，提高社会形象；第四，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，获得一些派系的支持，如程潜退出竞选后，他的大多数选票便转到了李宗仁头上。

1948 年 5 月 20 日，总统就职仪式在南京总统府内举行，蒋介石与李宗仁宣誓就任正、副总统，就此成为政治搭档。但实质上，两人的隔阂比以往更深了。蒋桂之间本就积有宿怨，此刻，冲突更加难以避免了。

（二）蒋、李之间的明争暗斗

蒋介石对于李宗仁及桂系力量的重新崛起，感到威胁很大。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，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就被易位，令白崇禧大为不满。这时候，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呈溃败的趋势，南京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而在此惊涛骇浪之中，同乘于危船之上的蒋李二人却愈斗愈烈。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，努力树立开明的政治形象，并加紧与社会各界的联络。他

的重要伙伴，也是他赖以维持政治地位的军权持掌者白崇禧也屡屡抗命，拒绝蒋介石为其安排的职位。他先是拒不就任华中“剿总”司令长官，后是不肯执掌中原部队，并试图逼蒋下台，让李宗仁取而代之。这一系列活动令蒋介石大为恼火，对李宗仁产生强烈愤恨，甚至一度制定暗杀李宗仁的计划。1948年11月，他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云南站站长沈醉到南京，亲自布置刺杀李宗仁事宜，并组成“特别行动组”。暗杀活动由沈醉主持，以秦景川、王汉文两人为其助手。这一行动实际上已布置妥当，李宗仁正处于随时可能毙命的境地。但此时局势变化迅速，李宗仁成了蒋介石希望加以利用的政治工具，所以在1949年1月20日，解散了“特别行动组”，李宗仁得以幸免。

（三）李宗仁成为“代”总统

1948年12月，国民党的统治已岌岌可危，共产党的军队迅速取得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，并将平津紧紧围困，国共两党的军事攻守之势已发生逆转。在此情况下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完全失望。国民党内部也严重分化，许多将领对蒋介石表示不满，要求停战言和。而共产党由于深知蒋介石的反共立场，不愿以蒋为和谈对象。在这种状况下，蒋介石迫于压力，同时也基于以退为进，获得喘息的考虑，思谋退居幕后，把李宗仁推到前台去支撑烂摊子，从而演出了一出“引退”的戏。此时，他更感到孙科竞选失败的后果可悲。如果此刻的副总统是孙科，引退的双簧可以玩得从从容容。但面对李宗仁，麻烦就很多，一个要做“假戏”，而另一个却要“真唱”。

当蒋介石提出自己要隐退，让李宗仁出面时，李宗仁执意不肯。蒋介石力劝他出面维持。1949年元旦，蒋介石发布文告，其中称“中正毕生革命，早置生死于度外，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，则个人进退出处，绝不萦怀，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”。公开表示行将退位。在此情况下，李宗仁认为时机已到，决意出马。与蒋介石反复讨价，最后蒋介石表示，他在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，声称要终老于雪窦寺（蒋在老家溪口的住宅）。实际上，所谓五年不干预的说法根本没有意义。一则，蒋介石仍是国民党的“总裁”，握有实际的权力；二则，就当时情况而言，恐怕他的“国家”连五个月也难保了。

李宗仁却把这种情况当做一次机会。他依赖美国的支持，企图取代蒋介石，并要成为“挽狂澜于即倒”，拯救“党国”的英雄。这样，李副总统就成为了李代总统。

白崇禧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机会，是桂系的一次机会。但他似乎比李宗仁更有谋略和经验。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以前，他反复叮咛要确立名分，提防蒋介石保留重新出山的可能性。

1949年1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，蒋介石在“总统”官邸举行紧急会议，与会者均为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。在会上，蒋介石说，在军事、政治、财政、外交皆濒于绝境的情况下，他个人非引退不可，让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，与中共进行和谈，他在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。根据这个意思，蒋介石是要辞去总统职位，依宪法规定由李宗仁继任总统。因为，五年不干政，意味着此届任期内他已不能再充任总统。李宗仁就是这么理解的。

在会场上悲伤、沉重的气氛中，蒋介石把一份替李宗仁拟好的文告拿出来让李宗仁签字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，四周一片呜咽之声，不容许我

来研究、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。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、不假思索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，蒋先生便收回去了。”

蒋介石利用氛围、掌握机会、揣度人心的本领确有过人之处。在兵败如山、政权倾覆在即之时，尚能玩出这等花样，难怪李宗仁不是其对手。

当李宗仁从天降大任于斯人、党国兴亡系于一身的悲壮情感中清醒过来以后，看到蒋介石即将发表的“文告”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暗暗叫苦。“文告”中对于权力交接一事，仅称“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‘总统因故不能视事，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’之规定，于本月二十一日起，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，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，共矢精诚，同心一德，颂赞李代总统，一致协力，促成永久和平……”

在此以前，桂系首领在白崇禧的主持下，为李宗仁提出的建议中，曾就此问题有所研究。他们指出，必须把“继任”和“代理”分清楚，应当坚持“继任总统”，而不是“代理总统”，否则名义不正，就不能顺利地执行职权。

此时，李宗仁看到文告中果然将其摆在“代理”的位置上，显而易见是蒋介石预留伏笔，以利于幕后操纵，必要时东山再起。他决定予以纠正，并向司法部长、法律界名家王宠惠询问有关事宜。王认为，“文告”中应有“身先引退”字样，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。

当李宗仁的意思转达给蒋介石后，他满口应承，指令按照李的意思修改，直到其满意为止。于是，李宗仁与其幕僚们连夜修正“文告”，然后交给中央社发表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瞎忙乎。次日早晨，各报所登蒋介石与李宗仁的“文告”，均为修改前的旧稿。此时，李宗仁才第一次看到他慷慨赴义

般签下姓名的，蒋介石为其代拟的“文告”的内容。“文告”称：“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代行总统职权……”

本以为要继续成为“总统”的李宗仁，此刻不明不白地戴上了“代行”的帽子，异常惊怒。白崇禧也从汉口打来电话，要李宗仁设法补救，告诫李做皇帝就要做真皇帝，切不可做假皇帝。

李宗仁在此情况下，声称名不正便就不就职，并发动力量为自己造声势。但闹来闹去，一通呼吁、一通发誓、一通反复解释宪法，结果，李宗仁还是当了个“假皇帝”。1月24日，李宗仁就任代总统，蒋介石再次得计。

由此，李宗仁“速正大位”的努力在混乱中流产。可以说，此时他已经为自己日后被推进“弹劾”的一隅之地打开了门。

（四）李宗仁的维持会与消极对抗

李宗仁就任“代总统”后，虽然“日理万机”，承担起军国大事，但仍丝毫不能扭转国民党战略上的崩溃局面。加之他坚持反共立场，并不真心和谈，和谈也随即破裂。李宗仁毕竟不能把死马医活。1949年4月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，隔江而治的希望也化为泡影。李宗仁的政府成了维持会，从南京“迁都”广州，从广州又到重庆，如同丧家之犬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一刻也没有真正放弃权力，通过各种途径发号施令。国民党政府内部也很快形成反李势力，处处与其作对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李宗仁也感到很失望。他曾和白崇禧商量与蒋介石摊牌，即，蒋李二人只能一人作主，要么蒋介石

复职、李宗仁出洋，要么蒋介石出国、让李宗仁拥有指挥政府的全部权力。但这个计划注定不可能实现。蒋介石不会在此时“复职”，承担失败的责任，更不会出国，权力撒手。相反，他却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，直接干预军政事务。在此情况下，李宗仁只有消极对抗蒋介石了。

南京失守后，“政府”全部迁往广州，李宗仁却临时决定飞往桂林。但在何应钦、阎锡山等函电飞驰，白崇禧等人亲临促驾的情况下，不得已又于5月7日飞往广州，“为防止中国赤化，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”。

此时，白崇禧等人劝李宗仁请蒋介石重新出山，李宗仁虽心有不愿，但也没有决意反对。蒋介石对此根本不予考虑。李宗仁只好在提出六项要求，获得蒋介石保障后，继续维持破烂不堪的国民党政府。由于蒋介石此时已决定经营台湾，因而对军事的布署与李宗仁大相径庭，处处拆台。九月中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分两路南下，广东防线如同虚设，未经激烈战斗就土崩瓦解了。

此刻，国民党政府又迁到了重庆。这时，蒋介石复职之说正沸沸扬扬，劝进之人不断，蒋本人也意欲复职。但此时，李宗仁却坚持不“劝进”，死活留在代总统的位置上，令蒋介石及党羽大为恼怒。

在此以前，李宗仁于九月中旬曾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。在梅花村蒋介石的行馆，蒋李二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。李宗仁当面斥责了蒋介石的所做所为，表示了他对蒋的极度不满。至此，两人关系完全破裂。

10月12日，李宗仁飞抵重庆。在重庆期间，他陷于蒋介石亲信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呼吁蒋介石复职的言论已公开化，李宗仁深知“蒋先生已呼之欲出，不久就要‘复职’

了”。同时，李宗仁周围的人劝其让位。此时的李宗仁，所能保持的唯一东西就是脸面了。他坚称，“我不准备自行引退，如果蒋先生要复职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”。并说“蒋先生如果要复辟，就自行复辟好了，我没有脸来‘劝进’。”

面对重重压力，李宗仁知道，如果蒋介石抵渝，定会以各种方法逼自己就范，从而来了个“走为上”。11月3日，李宗仁飞到昆明。刚到昆明，张群即尾随而至，劝其返回重庆，但李宗仁却旋即飞往桂林，回到广西老家。只有在这里，他才感到安全。正在此时，他的胃病发作，借此之机，他决定赴美就医，以此摆脱蒋介石的苦苦追逼。此时，蒋介石已飞抵重庆，并催促李宗仁前往，声称要与之“共商一切”。

（五）李宗仁携冠出洋

李宗仁在其政治生涯的尾声露了一手绝活，这就是“携冠出洋”。我们常可以看到位于某种职位的人，一怒之下“挂冠而去”，“弃官出走”。而李宗仁不然，他以携冠而走，给蒋介石以最后一击。因为虽然李宗仁只是“代总统”，但如果自己不“知难而退”，蒋介石径自宣布复职也有困难。

李宗仁谈到他与蒋介石争斗到底的原因时说：“我不愿意劝进的原因，并非迷恋名位，只是觉得蒋欺人太甚。起初，我并不想上台，是蒋强逼我做代总统的。在我到职以后，他把库存金银外汇和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台湾，并且先后肆意破坏守江计划和保卫广东的军事措施。等到局面搞垮了，他又要出来了，好象我的进退，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。”

11月19日，李宗仁致电“行政院长”阎锡山，令其全权处理政务。11月20日，他飞往香港，住进协和医院。11月